

## 序 言

# 威尔逊的悲剧和我们的悲剧

军队是这一计划的一部分。假如世界的道义力量还不够的话，世界的具体力量是足够的。但那是最后的选择，因为这一计划的目的是要构筑和平，而不是建立战争联盟。……这一文件（指国际联盟盟约）是和平的彻底的保证，它是反对侵略的彻底的书面保证，它是反对曾经几乎将整个文明大厦摧毁的那种东西的彻底的保证。

——伍德罗·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的演讲

1919年2月14日<sup>1</sup>

伍德罗·威尔逊的痛苦经历……是一出希腊式的悲剧，不是在想象的舞台上，而是在各民族的生活之中。

——赫伯特·胡佛，《威尔逊的痛苦经历》（1958年）<sup>2</sup>

## 威尔逊的幽灵和我们的未来

就像查尔斯·狄更斯的《圣诞颂歌》中雅各布·马莱的幽灵常常纠缠着厄布尼泽·斯克鲁奇一样，伍德罗·威尔逊的幽灵，从他那个时代直到我们现在，一直纠缠着世界领袖们，他的总统任期涵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部及随后的巴黎和会。威尔逊的幽灵传递出这样的信息：要了解使欧洲领导人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世界历史上，到那时为止史无前例的灾难——的愚昧；要当心这样的诱惑，以为仅凭设计好没有一个强大的国际组织维护的所谓“均势”，就可以维持可持续的和平。这一信息无人理会。不仅 20 世纪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血腥的世纪，而且我们进入 21 世纪时全球都在爆发冲突——到目前为止，冲突大多在国家内部发生——一场核灾难完全有能力将我们自己完全毁灭。我们在本书中将威尔逊的悲剧作为一面历史镜子来说明我们自己的安全危险，也将它作为一种激励，促使我们找到降低这些危险的办法。

自相矛盾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国人有一种非常乐观的、道德主义的和理想主义的情绪。一些美国人现在仍然清楚地回忆起那激动人心的一刻——1918 年 11 月 11 日，停战日那一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士们同意放下武器，赶赴巴黎缔结和平条约。当然，许多人庆祝仅仅是因为自己所爱的人在战争结束后可以回家了，但整个美国的庆祝远不只是盼望家庭团聚和回到正常生活。因为威尔逊总统使许多美国人相信，停战日不仅代表世界历史上残酷战争的结束，而且，用威尔逊的名言来说，它代表“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的结束。

在随后的巴黎和会上，威尔逊试图奠定制度基础以实现他认为是 20 世纪持久和平的两个重要前提：其一是“没有胜利的和平”，即为实现德国和它的欧洲敌人——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和解而缔结一个没有惩罚性的和平条约；其二是一个此后有权力维护和平的国际联盟。他认为，国际联盟领袖非美国人莫属，因为美国相对地没有利害关系，也没有许多欧洲国家因战争而产生的悲观情绪。威尔逊说道：“美国是世界上惟一一个理想主义的国家。”<sup>3</sup>

威尔逊没有实现这些目标。最终，德国受到了《凡尔赛和约》条款的羞辱和折磨，这些条款要求德国不仅要向德国的欧洲敌人割让大片领

士，而且还要德国向他们支付过分的战争赔款。此外，威尔逊的国际联盟因美国的退出——由于威尔逊未能劝服国会中的参议院批准建立国际联盟的条约——而变得无关紧要。1919年夏天，威尔逊在一次为了条约（的批准）而进行的全国演说旅行中中风，此后再也没有康复过来。美国参议院不久后否决了国际联盟盟约。因此，他个人的悲剧反映出他的国家和世界的悲剧。

假若这是一本历史著作，它就不仅会挖掘威尔逊失败的具体细节，而且还会努力寻求它们与现在的因果联系。<sup>4</sup>但这不是历史著作，不是一本关于威尔逊的著作，不是一本传记。这是一本关于威尔逊的幽灵的书，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这是一本将威尔逊的努力视为对我们的象征的书。这是一本记录了过去一个世纪重要历史教训的、关于未来的书——而且我们认为，借助我们的沉思默想，我们给该书起名“威尔逊的幽灵”，这将更充分而有力地阐明这些历史教训。

## 道德律令和多边律令

当我们面临新千年的第一个世纪时，过去 100 年的冲突给我们提供了两个教训。这两个教训都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及其后果，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包括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和短暂的后冷战时代。这些教训通过塑造 21 世纪美国外交和防务政策的两个律令最好地传递出来：

- 道德律令：

要把在 21 世纪避免像 20 世纪因为冲突而导致 1.6 亿人丧生，作为美国外交政策实际上也是全球其他国家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sup>5</sup>

- 多边律令：

认识到要实现减少大屠杀的目标，美国必须提供领导作用，但是在这样做时，它将不会单边行使其经济、政治、军事力量，除非在保卫美国大陆、夏威夷和阿拉斯加这些不太可能的情况下。

威尔逊面临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认为根据这些律令来行动是避免世界陷入更大的灾难之中的必要条件。20 世纪后来的血腥历史表明，威尔逊的主张是正确的。

这两个律令是他的激进纲领的核心。把它们更新一下，就成为我们纲领的核心。然而，在威尔逊时代，它们颇受争议，以致于他一个也没有颁布，这一失败导致了 20 世纪后来的更大的悲剧。我们希望促进有关两个律令和相关措施的辩论，这种辩论也许会在威尔逊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

这将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由于他试图将他战后的外交政策建立在道德律令——减少大屠杀——的基础上，有人就指责他是一个天真幼稚的理想主义者。譬如，康涅狄格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弗兰克·布兰狄更在与威尔逊的一次有关和平条约的会谈后就说，他感觉“就像是和爱丽丝一起漫游奇境一样，还和疯兔一起喝茶”。<sup>6</sup> 大英帝国的首相、出席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团团长戴维·劳合·乔治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真的认为，一开始，理想主义的总统就把自己当成一个传教士，其职责就是将可怜的欧洲邪教徒从他们长期以来对错误的和暴烈的诸神崇拜那里解救出来。他情不自禁地用那种腔调向我们演讲。”<sup>7</sup> 毫无疑问，威尔逊看起来可能很天真，自我感觉很公正。然而，接踵而至的 20 世纪的悲惨史强烈地表明，劳合·乔治和其他自称是现实主义者的欧洲人如果仔细聆听了美国“理想主义者”的声音，本来可以获益匪浅。

威尔逊对使用武力必须得到多边授权的坚持，是美国参议院拒绝国际联盟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导致美国没有加入该组织的重要原因。多边律令是与减少大屠杀的道德律令相一致的威尔逊的计划的核心理念。

在威尔逊时代，原则是这样的：美国、以及所有国际联盟的成员国必须将主权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让渡给国际联盟，由国际联盟来决定是否在国外使用武力。威尔逊认为，直到大部分宣战权交给像国际联盟这样的国际团体，防范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误判、幻想、猜疑、将错就错的决策才有保障。因此，国际联盟成员国的安全将是集体的，如果世界上所有加入国际联盟的国家都接受这一条件，那么国际联盟将变成一切联盟之母的某种东西，所有国家都从所有国家那里受到保护。

威尔逊的多边律令体现在《国际联盟盟约》第十条上，这一条是威尔逊亲自起草的，内容如下：

联盟会员国有尊重并保持所有联盟各会员国领土之完整及现有

政治上之独立，以防御外来侵犯之义务，如遇此种侵犯或有任何威胁或危险之虞时，行政院应筹划履行此项义务之办法。<sup>8</sup>

威尔逊拒绝了一切旨在删除、修改《国际联盟盟约》的这一部分的企图。正如他在 1919 年 8 月 19 日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所说的：“对我而言，第十条就像是整个盟约的支柱，没有这一条，国际联盟最多不过是一个有影响的辩论协会。”<sup>9</sup>

威尔逊绝对意识到，只有通过第十条才能使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决策民主化。而且，威尔逊认为，只有通过第十条，人们才会清楚，牺牲别人、为自己寻求单方面的好处绝不会受到容忍并将会受到严厉制裁。威尔逊还认为，假如在 1914 年第十条就生效，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能永远不会发生，因为与其他大国一样，德国会预先看到它最终实施的侵略中立的比利时会给他们带来相反的后果。如果没有第十条，国家和领导人在危机时刻肯定会动摇（信念），这时“战争意志就是一切”，正如在 1914 年 7 月危机中所发生的一样。<sup>10</sup>因此，在国际联盟的一些或其他所有成员国的军队保证会做出相应的军事惩罚的威慑下，任何一个成员国都不能单方面地采用武力来反对其他成员国。

对国际联盟的反对集中在《国际联盟盟约》的第十条上。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马萨诸塞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领导了这场反对运动。洛奇正确地认为，第十条的要求大大削弱美国的主权，所以他将第十条看作是不符合美国宪法的，也是非美国的，他建议将草稿修改如下：

美国对维护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不负有任何义务，也没有责任介入国家之间的纷争……在第十条的条款下……除非在某个具体的事件中，国会——根据宪法独享宣战权或授予部署美国陆军和海军力量的权力——通过行动或联合决议，才能这样做。<sup>11</sup>

换言之，美国宁愿保持其传统的单边律令——在决定何时、何地、为何动用武力时保持它的独立性。威尔逊对此了然于心，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洛奇的建议。

于是，威尔逊发现自己坚决不同意修改的是一个他认为是国际联盟绝对必要的东西——体现在盟约第十条的多边律令。没有这一条，威尔逊预感到像欧洲刚刚结束的那样灾难还会有更多。威尔逊感到自己是在

“负隅顽抗”，他开始了在美国的不走运的巡回演讲，试图通过直接诉诸美国人民来向参议院施加压力。

尽管精疲力竭，健康每况愈下，但威尔逊在为第十条的必要性进行辩护时常常慷慨激昂。他宣称：“我毫不犹豫地要说，我们刚刚经历的那场战争，尽管我们感受了各种各样的恐怖，与我们下次将不得不面对的战争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sup>12</sup>在圣路易斯，威尔逊告诉他的听众，没有《国际联盟盟约》的第十条，没有美国对该组织的领导，“在未来某个时候，在上帝的愤怒的启示下，将会有一场战争的到来。在那场战争中，不是数十万、而是数百万的美国人将不得不死去”。<sup>13</sup>

在这次巡回演讲期间，1919年9月25日，他在科罗拉多州的帕布罗的一次演讲后中风。他和《国际联盟盟约》的第十条都未曾康复。11月19日，参议院以55比39的多数毫无保留地否决了条约。威尔逊肯定不会接受对第十条的任何保留，《国际联盟盟约》也就寿终正寝了。

没有人能下结论，美国对国际联盟的领导会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然而，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本来有降低大屠杀的可能性。威尔逊未能防止对德国的惩罚性行为，最终为报复欲望很强的阿道夫·希特勒培育了成长土壤，而欧洲国家未能履行第十条恰恰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与纳粹的暧昧关系，随后“绥靖”一词永远地背上了恶名。<sup>14</sup>

## 为什么是威尔逊？为什么是现在？

不单是我们感觉到，当21世纪曙光乍现时，威尔逊的幽灵正在纠缠我们：威尔逊未能使欧洲盟国将它们的外交政策建立在防止大屠杀的道德律令的基础上，他未能使美国参议院批准体现多边律令的第十条。乔治·凯南——一个早期批判“理想主义者”威尔逊的狂热的“现实主义者”——像其他人一样，最近认识到，时代最终会理解威尔逊的。1991年，凯南写道：“我现在把威尔逊看作是一位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像其他具有远见和敏锐的人一样，他没有活到20世纪末，因而也不知道他的许多思想所取得的伟大的和重要的意义。”<sup>15</sup>其他许多观察家也注意到，冷战结束后，“威尔逊主义”突然之间又成为显学。第一章将介绍他们的观点。

为什么现在，在冷战后，在我们当代的几乎所有重要方面，威尔逊

看来与我们息息相关？最根本的原因是，几乎是威尔逊一人在那个时代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消耗一切的特性、因它而产生的大量死亡人数及为防止另一次灾难而制造全面激进计划的必要性。有人称之为威尔逊的“国际主义危机”<sup>16</sup>。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于威尔逊就像古巴导弹危机之于约翰·F. 肯尼迪总统：透视人类灾难的深渊后，下定决心“使我们永远不再走这样的路”。<sup>17</sup>冷战虽然结束了，但与之相联系的恐惧仍然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人们的记忆中，现在是采取激进手段来减少如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看到的人类浩劫的危险的时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开了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一个世纪的先河。这是威尔逊最根本的要求，也是我们最根本的要求。

威尔逊的世界与我们的世界还有其他相似之处：与差不多一个世纪前的威尔逊一样，我们是在世界政治体系发生重要演变后，展望未来的；对威尔逊来说，那是灾难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许多大国的政府和帝国的崩溃；对我们来说，是东西方之间 50 年冷战预想不到的、迅速的、几乎没有流血的结束，是苏联及其帝国的解体。像威尔逊一样，我们试图将战后世界建立在我们认为是道德律令的基础上：迅速减少前一时代的浩劫。还有，对威尔逊而言，目标是避免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四年间所发生的浩劫的覆辙。而我们是想要避免重蹈 20 世纪所有战争中被杀死的千百万人的覆辙。因此，我们，就像我们之前的威尔逊一样，试图从悲惨的历史中汲取教训，以便未来不再重复过去所犯的错误。

## 威尔逊失败的教训

但在 21 世纪，我们能在 20 世纪威尔逊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吗？我们认为我们必须成功。但首先，我们得问：威尔逊为什么失败？如果我们能够认清威尔逊没有能够实现其计划的原因，那么就有可能从他的错误中汲取教训，提高这一次获胜的希望。下面列举的主要是威尔逊的错误，或者说是那些在我们看来与即将出现的 21 世纪的世界密切相关的错误。

## 道德律令对道德主义

威尔逊青少年时代生活在（美国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他在美国内战及其后的重建时期获得了一种道德远见。这种道德远见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而得到强化，并成为威尔逊行事的强大驱动力。<sup>18</sup> 这种远见是：创立一种全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将大大减少他一生所经历的两个历史性悲剧的浩劫重新发生的危险。然而，与他的长老会信徒的背景不相符合的是，对许多人来说，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以及就第十条与国会打交道中，表现出一个居高临下的、毫不妥协的道德主义者的姿态。他经常喜欢说教，而不是协商。他拒绝让步。他藐视那些被归入“现实主义者”一类的人——那些致力于寻求“均势”的人——而不是与他们接触。就此而言，他变成了自己的最坏的敌人，而那些反对者像他的副手赫伯特·胡佛一样，更愿意美国参与没有第十条的国际联盟，而不是根本就不参加。

教训：不要让道德主义的自以为是挫败一项以道德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的实施。第一章要分析我们以道德为基础的激进的外交政策概念以及当代怀疑论者——政治“现实主义者”、自由派和孤立主义者（或最低限度主度者）——其目的是激起人们的讨论而不是一锤定音、为此问题提供最后的答案。

## 多边律令对表面上的多边主义

威尔逊的国际联盟没有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呢？在纳粹统治下，德国的扩张主义由于国际联盟的成员国之间缺乏相互安全担保而没有在开始的时候遇到实质性的抵制。人们会推测，在缺乏执行机制——在威尔逊看来，《国际联盟盟约》第十条本来是可以提供这种机制的——情况下，假如美国加入国际联盟，事情是否会发生变化。就像事实上发生的那样，国际联盟变成了威尔逊害怕它会变成的样子——一个提倡欧洲主权的、假装成多边主义者的、单边主义者的辩论协会。（在这一时期，由于缺乏与国际联盟的任何联系，美国的单边主义者变成了孤立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办法，来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参战国在涉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交出主权，建立一个相互联系的集体安全机制。

教训：在愿意建立可信的国际机制和地区组织时，如果没有对多边决策做出坚定承诺，那么，持久的和平不过是幻想。关于多边主义及其批评者的问题将在第一章和第三章中谈到。我们着重谈所谓美国例外论的难题，以及我们所看到的，对多边安全关系进行重大变革的必要性，尤其是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地区安全组织中。

## 防止大国冲突的危险对挑起大国冲突的风险

尽管威尔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他在巴黎还是未能阻止欧洲列强不要对德国进行严厉惩罚。这些欧洲列强一心一意要报复，根本没有考虑羞辱一个大国所带来的长远后果。历史学家约翰·基根一语中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悲惨的、不必要的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人数是（第一次的）五倍多，物质损失更是不计其数，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结果。1922年9月18日，一个前线复员军人阿道夫·希特勒对惨败的德国提出一个17年后他兑现了的挑战：“两百万德国人不能白白牺牲……不，我们不要求宽恕，我们要求——复仇！”

在整个他摧毁的欧洲大陆，复仇的标志（至今）还矗立着。<sup>19</sup>

总而言之，威尔逊未能让欧洲战胜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明白他强烈感觉到的某种东西：在战争结束后对德国困境的同情、对德国进行如此惩罚的可能后果、因此而导致的另一次更具毁灭性的大国冲突的危险进行换位思考。

教训：要么对你的敌人进行换位思考，要么冒着大国之间因某种错误估计、错误认知和错误判断而引发的灾难性战争的风险。我们要在第二章中通过考察诸如科索沃战争、北约东扩、美国建立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的计划、扩大美日保障安全条约的范围及与台湾有关的困难问题、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可能影响来展开这一论点。

## 减少部族杀戮对非故意地鼓励部族杀戮

威尔逊未能解决特别困难的一些问题，如主权、（民族）自决权和干预。现在，在21世纪曙光初露的时候，这些问题又一次提到了前台，

而且是以它们在 1919 年同样的理由提出的。

许多民族和国家被迫遵守大国确定的国际边界的时代结束了。威尔逊表面上常常允诺那些要求民族自决的地方进行民族自决——这一点很容易造成混乱。威尔逊很晚才认识到，他热情支持的普遍民族自决权是行不通的，而且也很危险。例如，他对前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内的种族多样化的重要意义估计不足。他对于这些民族团体中相互抱有的敌意和猜疑的深度和历史根源——这些因素将使局外人对他们进行任何影响的任何努力复杂化——也没有给予足够的考虑。

教训：重新划定国界，特别是新国家的分离和建立，都可能是危险的和不稳定的，所以应当只将这种做法当成是最后的解决办法。即使到那时，也只有当新的国界不会威胁到有关国家才行。第三章将谈论这些问题及与此相关的问题，诸如何者构成战争罪，如何才能防止战争罪、如果要减少部族杀戮，国际组织必须进行何种改革等。

一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总体战争”，意思是，发达工业国家千方百计地要互相消灭。空中力量第一次显示出不同寻常的威力。1916 年夏天，英军在索姆河战场第一次使用坦克，并且在随后的六个月的大屠杀中不断增加坦克的数量。威尔逊和其他人常常将这次战争称为“文明大战”并非空穴来风。战争如此意想不到地就爆发了，战争是如此地血腥，在人员和物质方面的损耗表面看来是如此地没有意义，文明自身好像半悬于空中。战争结束时，在一种可以理解的但是盲目的希望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变成了“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更大。战争结束时，未来战争的前景更加惨烈，如果主要大国参加一场核武器战争的话。威尔逊和他的同代人的恶兆真正变为现实的可能性更大：所有国家、甚至文明本身都可能被毁灭殆尽。这种最终的景象在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在有关领导人的头脑里挥之不去，此次危机是世界最接近核战争的一次。<sup>20</sup>

一场灾难性的核战争在目前和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确实是可能发生的，确实需要采取大胆措施来减少危险，这些措施允许迅速安全地回到无核世界。第四章的主题是有关避免核战争的问题，外加朝着威尔逊指出的方向前进的紧迫性。

## 又一次威尔逊的悲剧？

战后欧洲食品救济负责人、（已故总统）赫伯特·胡佛在 1958 年曾写道：“伍德罗·威尔逊的经历……是一出希腊式的悲剧，不是在想象的舞台上，而是在各民族的生活之中。”<sup>21</sup> 威尔逊的悲剧之大，可以由威尔逊在巴黎的期望（保证刚刚结束的战争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与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正确地描述为“毁灭性的世纪”<sup>22</sup> 的恐怖历史之间的差别来衡量。

我们注意到那些曾在 1918 年经历了停战日的人快乐无比，部分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正在庆祝“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后来成为）美国外交官和历史学家乔治·凯南那一天刚好 14 岁，在家乡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目睹了欢庆场面。1984 年 11 月 11 日，80 岁的凯南在《纽约时报》上写下面这些话时，他描述了威尔逊的幽灵一直游荡在过去数十年的岁月中：

1918 年 11 月 11 日，人们所知的历时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疯狂杀戮结束了。当枪声停止时，大约 850 万年轻人战死并埋葬在弗兰德斯草原或这场战争的其他大战场；2000 多万人受伤——他们中的许多人将终身残疾；约 800 万人被列为失踪者或当了俘虏。……

这一时代的我们呢？我们怎么样？我们现在距离 1918 年的停战日已长达 60 年了。我们前面的例子不只是那场战争，还有第二场战争，其毁灭性和不幸的后果绝不亚于第一场战争。如果我们被人们这样说，我们曾考虑过这些恶兆的教训，并开始以谦卑的、认真的态度来使我们的国家行为建立在避免促使我们的父辈和祖辈犯这种愚蠢错误的疯狂决心的基础上……

如果文明要生存下去——所有国家的政府最终将认识到这一点，只有这样一个问题：他们能很快认识到这一点吗？留给我们做出改变的时间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它也许比我们许多人猜测的都要短。<sup>23</sup>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是通过防止重复上一世纪的冲突而提高 21 世纪文明的生存机会。



# 第一章 一个激进的议程

## ——美国在 21 世纪全球安全中的作用

惟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拒绝别人赋予我们的道德领导责任，我们是拒绝还是接受世界对我们的信心。

——伍德罗·威尔逊，1919 年 7 月 10 日<sup>1</sup>

威尔逊的大厦、1945 年它的罗斯福版本、1990 年（老）布什描绘的新图画的外表，所有这些都是用来应对一个充满国家间冲突的世界……如今国家的本质处于危险中……国际主义因而面临着一个困境。首先，它需要一套清晰的原则以界定目标。

——斯坦利·霍夫曼，1998 年<sup>2</sup>

冷战的终结使得人们乐观地期待着 21 世纪的世界和平。1990 年 10 月，乔治·H. 布什在联合国讲话中说欢迎“旨在促进民主、增加繁荣、增进和平和削减武器的伙伴关系”。<sup>3</sup> 三年后，比尔·克林顿总统告诉联合国，“在危险和机会的新时代，我们压倒性的目标是扩大和加强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世界共同体”。<sup>4</sup> 然而，在 21 世纪开始时，即使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仍然没有受到挑战，发表这种宏伟宣言时很少不附加条件、矛盾和不确定性的。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后冷战时代，大规模的残酷战争和部族屠杀已增加，核灾难的危险现在仍然存在。威尔逊的幽灵——对不能再次防止大战后的战争灾难的恐惧，越来越普遍。在下述几章中，我们强调我们的第一责任就是改变这些令人惊恐和危险的全球趋势。我们要为美国和世界基于道德律令的新外交和防务政策奠定基础，以减少因战争而造成的死亡。美国承诺领导世界实现这个目标，但永远不会单方面地运用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

## 20 世纪的大幻想

当我们从 21 世纪回顾 20 世纪发生的事件时，我们不禁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无数的人被屠杀而感到震惊。实际上，人们很难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星球中某种东西肯定在诅咒 20 世纪，肯定在一心使 20 世纪几乎从始至终都要充满血腥味。然而，回想 20 世纪刚开始时，许多有思想的人和知之甚广的人对和平与繁荣抱有无限的期望。有人目睹了技术带动下经济上的越来越多的相互依赖后，甚至认为大战已经绝迹了，正如马和马车正在过时一样。回想起来，这种信念导致了一定程度的自满，这种自满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今后一个相互依存蓬勃兴起的时代，我们敢宣称这种事不会再一次发生吗？

1910 年前，欧洲享受着史无前例的增长和繁荣，这种情况使欧洲大国和美国在经济上进行同样史无前例的合作及协调成为可能。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这些国家的许多政治领导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和普通人犯了牛津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最近所说的“现代历史上最大的错误”。<sup>5</sup> 他们作如下推断——有些是有意识地，有些是无意识地——首先，大国之间新的相互依存和合作对于繁荣来说是必要的；其次，任何摧毁繁荣

的这些条件的事也将摧毁繁荣本身；第三，大国战争的爆发必将扰乱、甚至可能摧毁繁荣；第四，有关各方均明白战争与经济灾难之间的这种联系；所以，第五，大战不可想像。通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地狱之路就是根据这种逻辑铺成的：既然战争对经济有反作用，那么明白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防止它，或者在一场极不可能爆发的战争中，由于同样的原因，敌意很快就会被消泯。

这一思路正式体现在英国记者诺曼·安杰尔 1910 年出版的畅销书《大幻想：军事力量与国家优势的关系研究》中。安杰尔一开始就证明战争是不可理喻的——不值得付出代价——因而是过时的东西。安杰尔问道：“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善意行为的真正保障是什么？”他的答案是：“紧密的相互依存——不仅是经济方面的，而且是每一个方面的——使得一个国家从对另一个国家的侵略中得到的好处是没有保障的。”<sup>6</sup> 因为战争不再有任何意义，安杰尔说：“通过武力来获取进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人类的进步除了通过思想来获得外，别无他法。”<sup>7</sup> 在《大幻想》出版两年后，安杰尔在讲话中总结说：“毕竟道德不是建立在自我牺牲之上，而是建立在开明的自我利益和越来越多地、越来越清楚地理解把我们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所有联系之上，而且这种理解注定要加强。”<sup>8</sup> 美国人也没有免除这种奇怪而又致命的自满（的影响）。1910 年，斯坦福大学校长戴维·斯塔尔·乔丹在塔夫茨大学的演讲中说：“未来不可能发生战争，因为各国承受不起。”<sup>9</sup>

不是每个人都对此深信不疑。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在 1910 年的评论“战争的等价物”——文中承认：“现代战争太昂贵了，我们感觉到通过贸易来获利是一条更好的途径。”但他随即补充道：“现代人继承了其祖辈的一切内在的好斗性及荣誉感，这表明战争的疯狂和恐怖对他毫无影响。恐怖创造了吸引力。”<sup>10</sup> 詹姆斯的话几乎准确地预先描述了 1914 年英伦三岛上发生的事件，当时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伴着欢歌笑语、洪水般地涌入征兵站，挤着向前，竭力成为最先参战的士兵，仿佛他们是去参加体育比赛或去野炊。

诺曼·安杰尔在 1910 年开始揭示的“大幻想”——正如他看到的——是一种过时的信念，即任何经济的或其他的好处均来源于军事征服。令他和他的许多读者满意的是，在证明了这一点后，他得出结论说：战争已经变得很肮脏，因此绝对不可能发生。这是 20 世纪的大幻想。在安杰尔的书面世四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了他的看法是错误的，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一再证明他的看法错了。

## 20 世纪的悲惨现实

事实上，迄今为止，20 世纪已变成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有多血腥？可以得到的统计数据，尽管在比较意义上有帮助，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常常是错误百出的。所以，在列出一些估计数字前，有必要提及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丹·史密斯发出的警告——他的《战争与和平状况》地图册是战争死亡人数及有关议题的重要参考书：

战争死亡数据最不可靠，这其中的缘由是争议各方的宣传需要。在多数战争中，没有一个负责清点非武装人员死亡人数的机构，而非武装人员的死亡构成了战争中的主体……估计不是基于事实，而是人为的和出于政治考虑的。议题不是有关统计方面的。把一个数字增加到死亡人数上仅是为了使人们容易了解所发生的恐怖的一种简便方法。<sup>11</sup>

因此，几乎任何一个被派遣来清点战争死亡人数的人，或者处于某一位置这样做的人，也可能是仍在进行的战争中倾向于这一方或那一方的人。颁布战争死亡人数的数据常常等于是用统计的方法来进行战争。也就是说，对于其主要工作就是筛选数字的人的估计，需要认真考察，将偏见尽可能地考虑进去。

战争是什么？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PRIO）的人是这样定义的：“一种公开的关于权力和领土的武装冲突，主要涉及有组织的战士和冲突方之间持续的战斗。”<sup>12</sup>就 20 世纪这些战争的数字而言（到 1995 年，1995 年被认为是数据相对全面的最后日期），人们广泛引用的估计数据是，1900—1995 年，国家间的战争有 83 次，国家之内部的战争有 135 次，总起来是 218 次。比较起来，1816—1899 年，国家间的战争有 102 次，国家内部的战争有 69 次，总计才有 171 次。<sup>13</sup>而且 20 世纪的战争比以前所发生的战争杀伤力更大。事实上，据估计，20 世纪“每次战争的死亡人数是 19 世纪的 6 倍”。<sup>14</sup>总起来看，依次有 1.1 亿人由于 1900—1995 年的战争而死亡。一份常被人引用的材料，鲁斯·莱杰·西瓦德的《世界军事与社会开支》，将战争的死亡人数修订为 109,746,000（令人

奇怪的精确)。<sup>15</sup>

战争性质改变的指标是平民受害的比例。有材料说在 20 世纪战争中被杀戮的人估计有 1.05 亿人，其中军人 4300 万，平民 6200 万。<sup>16</sup> 另有人估计，在 19 世纪末战争死亡人数中大约有 10% 的人是平民，而在“二战”中死于战争的人中有 50% 是平民，在（20 世纪）90 年代爆发的战争中，平民占死亡人数的 75%。<sup>17</sup> 从所有这些估计来看，很清楚，20 世纪战事频仍，而且越来越致命，死亡人数主要落在平民身上——非武装人员、老人、妇女和儿童上。

20 世纪不仅是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而且是非武装人员不能幸免的世纪。非武装人员可以幸免——西方长久以来坚持要求的“正义”战争——实际上不再起作用。德国记者和学者约瑟夫·约菲最近为 20 世纪写了如下的墓志铭：

我们将如何记住 20 世纪？首要的是，这是三个“T”的世纪：总体战争（total war）、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和恐怖（terror）……在 18 和 19 世纪，敌人被打败了；在 20 世纪，他们被消灭在类似奥斯威辛或柬埔寨的屠宰场上。<sup>18</sup>

这同样适用于 1945 年 8 月 6 日在广岛即时死亡的大约 14 万人，也适用于斯大林使其人民遭受制度性恐怖的受害者。<sup>19</sup> 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死于斯大林在（20 世纪）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清洗和强制性搬迁，又有多少人死于与中国大跃进计划相联系的灾荒和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通常引用的数字是每个国家有 2000 万）。完全可以说，千百万人死于斯大林分子和中国极左派的残酷和错误。

显然，无论人们对 20 世纪战争或国内冲突的死亡人数做什么修正，数字本身只是为了说明悲剧的广泛程度。无论人们将死亡总数如何划分，在构成人数有关方面也不会有精确的数字。

但假如有约 1.1 亿人由于 1900—1995 年的战争而死亡，假如苏联等共产党国家有 4000 万人死亡，假如 1000 万人（这一数字常被使用）死于 1995—2000 年的战争或与战争相关的原因，我们马上得出一个数字：约有 1.6 亿人死于冲突——包括国际冲突和国内冲突。我们认为这一数字——死于战争或与战争相关的死亡人数 1.6 亿人——是一个有用的比较接近的数字，能够说明刚刚结束的这一个世纪的残暴程度。

如上所述，约 1.6 亿人中大多数本来是平民。有多少呢？如果我们